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进步：反对货币操纵

欧盟应该对美国贸易战威胁进行反制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

中美贸易战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中国一带一路的代价

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地位依然稳固

本期编译

安婧宜

史明睿

吴克谦

王婉婷

伊林甸甸

杨茜

张寒堤

张舜栋

张子萱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张寒堤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进步：反对货币操纵 6

导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的达成是具有历史性的，因为它是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解决贸易伙伴国货币操纵问题的贸易协定。协定中关于反对货币操纵的条款并非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今后的贸易协定提供了参考准则。

欧盟应该对美国贸易战威胁进行反制 9

导读：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多个国家举起了贸易战的大棒，其中包括不少美国的重要传统盟友，比如欧盟。作者引入了简单的博弈论框架进行分析，并建议欧盟尽快采取反制措施，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减小欧盟的损失。

重塑 WTO 14

导读：CSIS 上周举办了美国大使 Dennis Shea 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公众访谈，关于重塑 WTO 的讨论再一次被提上日程。WTO 的通报原则和差异化原则的落实都遭受到非议，新兴经济体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挫伤了发达国家承担义务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担心对于 WTO 的批评无法解决，而特朗普总统会退出 WTO 组织，这将对美国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伤害。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 16

导读：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获奖理由是他们分别将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纳入到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本文将回顾各位经济学家对该颁奖结果的反响。

聚焦中国

中美贸易战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19

导读：美中贸易战迅速升级，有可能破坏两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本文初步估算了贸易战对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影响。通过结合贸易和关税数据，本文对预期影响进行了估算，并推算出了该地区可能的赢家和输家。

国际市场对中国新开放政策响应平平 25

导读：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热烈欢迎。然而近期银监会和保监会放宽中国金融机构外资所有权限制的举措却反响平平。对于中国来说，改革迈出的步伐过小、举措过迟可能是造成明显利益缺失的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负重前行 28

导读：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国内信心遭受打击、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政府流露出了一些不安情绪，采取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正在放缓，但形势并没有很严峻，所以仍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以免悲观情绪被放大。

中国一带一路的代价 30

导读：北京方面看似无止境的贷款并非毫无附加条件。记者萨米拉·沙克尔探究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对亚洲的影响。

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地位依然稳固 34

导读：众所周知，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业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位置。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否能够逆转这一趋势，并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呢？作者认为，尽管贸易战引发了跨国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普遍担忧，但中国在这一领域依然拥有显著的优势。

本期智库介绍 38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进步：反对货币操纵

C. Fred Bergsten/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的达成是具有历史性的，因为它是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解决贸易伙伴国货币操纵问题的贸易协定。协定中关于反对货币操纵的条款并非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今后的贸易协定提供了参考准则。编译如下：

特朗普总统宣称他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新贸易协议（USMCA）是历史性的。从某一方面来讲是正确的：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解决贸易伙伴国货币操纵问题的贸易协定，伙伴国货币操纵问题一直在贸易协定签署国中广受诟病。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阻止贸易伙伴国家以获得贸易优势为目的操纵外汇市场。现实情况已经引发了美国对贸易协定和全球化更广泛的政治抵制。

USMCA 的货币章节不太可能影响墨西哥或加拿大，因为两者都不是货币操纵国家，也都处于经常账户赤字状态。这些条款可能成为今后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重要模板。

1、货币操纵如何演变为贸易政策问题

在 2003-2013 年期间，货币操纵成为贸易政策的中心问题（Bergsten & Gagnon 2017），当时大约有 20 个国家严重干预外汇市场，平均每年金额超过 6000 亿美元。通过保持对本国货币的低估，他们降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加强了国际竞争地位，增加了贸易顺差。操纵国主要由亚洲制造业国家、石油出口国、金融中心国家组成，典型国家为瑞士和新加坡。

由此导致的货币错位每年使超过 2500 亿美元的贸易额从赤字国转移到盈余国家。美国至少损失了一百万个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已经很高的前提之下，美国依然在损失就业机会。欧洲国家也同样如此。

Autor 等人曾在 2016 年撰文认为：截止到撰文之时，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曾经积累了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常账户盈余增加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占 GDP 的 10%。中国所有经常账户盈余均因货币操纵产生，货币操纵也是造成“中国冲击”的主要原因，对美国制造业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见 Autor, Dorn & Hanson 2016）。

2013 年之后，中国在大幅削减货币操纵程度，其经常账户盈余已降至 GDP 的 2% 以下。然而，中国不这么做，还会有其他一些国家偶尔操纵本国货币，这种做法非常普遍。

2、贸易协定成为打击货币操纵的舞台

在 2014-2015 年的贸易促进局（TPA）立法中，国会授权“避免操纵货币”作为美国未来贸易协定的主要谈判目标，并通过了单独的立法，要求与任何违反协定中“避免操纵货币”目标的国家“加强协商”（Bergsten 2014）。奥巴马政府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TPP）就货币问题达成了关于不操纵货币的附带协议，但特朗普在去年就职后退出了 TPP。

新的 USMCA 协定中的货币章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各方持续披露和公布与外汇市场活动有关的所有数据，允许数据存在滞后性，具体包括干预总额、储备水平等数据。这是新 USMCA 协议中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性的部分。

第二，必须通知协议其他国家“何时”干预货币。这一条款的灵感来自 2013 年 2 月的七国集团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组建的新政府曾进行积极（“喋喋不休”）的口头干预，在 2012 年末压低了日元。七国集团在随后达成协议，出台干预政策需要通知其他国家，如果新干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进行干预“之前”而非“之时”进行协商会更好。而在实践中，七国集团的承诺显然被解释为事先磋商，并且迄今为止已得到充分遵守。

第三，最重要的是，双方确认，缔约国将“不操纵本国汇率，远离那些为了调整本国国际收支平衡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货币的行为”。每一缔约方应允许其汇率在市场力量下自由浮动并“避免竞争性贬值，包括通过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如果缔约国偏离这些规范且不能与 USMCA 的其他合作伙伴达成一致，该国政策将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监督。

3、部分新货币准则对加、墨没有实施的必要，但它完善了应对货币操纵的国际标准。

这些准则应作为强制执行义务，而非警告性假设，纳入美国未来的贸易协定。随后就可以对同一贸易协定中没有履行义务的国家使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强制执行手段，例如回调关税削减程度，而拥有强制执行措施使美国国会更容易应对贸易协定签署后贸易伙伴的货币操纵行为。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 USMCA 货币章节加强了对外汇市场中什么是适当行为的假设，使得参与国（甚至非参与国）更难进行以往的操纵行为。

在未来与韩国、日本或中国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中，加强汇率操纵方面的国际准则可能都相当重要（Bergsten, Hufbauer & Miner 2014）。虽然 2013 年之后操纵行为的大幅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造成的，但国际社会对操纵行为的强烈反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别国的货币操纵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国会对奥巴马政府整个贸易自由化议程（包括 TPA 和 TPP）的怀疑。

4、USMCA 不会限制负责的货币政策

USMCA 不会限制负责的货币政策，即美国需要确保任何有关汇率干预的新规则不会限制美联储或其他国家央行在必要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尽管此类货币刺激政策可能会削弱国家的汇率，并被部分人视为“操纵货币”，但刺激政策几乎仅受国内因素推动。IMF 的研究显示，货币刺激政策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外部影响基本上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的）。

新的贸易协定包含一项明确的条款，将（必要的）货币政策排除在其职权范围之外。此外，由于贸易协定中的承诺（与透明度相关的承诺除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不应担心该协定或未来可能达成的协定会限制负责的货币政策。

在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不断努力以构建一个完全有效的体系结构。在加强美国贸易和国际货币政策方面，USMCA 的货币章节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积极的。它应该能减轻美国国会对伙伴国汇率操纵的担忧，促进贸易协定通过。

本文原题为“A Positive Step in the USMCA: Counter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本文作者 C. Fred Bergsten 为 PIIE 高级研究员和名誉主任，曾于 1981 年到 2012 年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主任。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盟应该对美国贸易战威胁进行反制

Maria Demertzis, Gustav Fredriksso/文 张舜栋/编译

导读：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多个国家举起了贸易战的大棒，其中包括不少美国的重要传统盟友，比如欧盟。作者引入了简单的博弈论框架进行分析，并建议欧盟尽快采取反制措施，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减小欧盟的损失。编译如下：

最近，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与多个国家大打出手。起先，贸易战的对象仅限于中国，但很快欧盟和其他国家也相继沦为美国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受害者。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美欧关系在贸易领域出现的裂痕可能给欧盟带来的综合影响。我们认为，贸易战对美欧双方来说意味着双输的局面。而面对这种形势，欧盟别无他法，只能选择反制。对于欧盟来说，眼下最好的止损手段唯有坚定地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并与世界其他国家继续维持开放和自由的贸易关系。

自今年早些时候起，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3月23日，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价值超过28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钢铝关税。作为回应，中方于4月2日立即还以颜色，对超过24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相应的报复性关税。虽然起先还得以置身事外，但仅两个月后，欧盟也被美国征收了25%的钢铁产品税和10%的铝产品税，总价超过64亿欧元的对美出口将受到影响。6月22日，欧盟宣布将对美国进行有限的反击，新增的关税将影响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对欧出口。

以上事件意味着，美国正式在全球范围内挑起了多场双边贸易战，这不仅对全球经济复苏投下了一层阴影，还严重威胁着现行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对于欧盟来说，美国不仅一直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享有相似价值观的亲密盟友。美国政府当前采取的种种政策，是否会破坏美欧关系？而欧盟对此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明确贸易战到底会给欧盟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认为，贸易战将从两个方面损害欧盟利益：一是贸易战将扰乱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影响欧盟企业的生产经营，并最终使消费者被迫承担更高的商品价格；二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做法使得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国际贸易秩序愈发脆弱，如果美国继续抛弃其以往坚持的正确原则，WTO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严重的创伤。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日后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力求维护和支持WTO的发展。

要妥善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欧盟必须回答两大问题：第一，如何妥善应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力图使欧盟受损最小；第二，如何确保美国的一意孤行不

破坏当今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我们认为，欧盟必须对美国的威胁加以反制，这是欧盟目前唯一可行的做法。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目前的局势，我们需要在此引入一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假设国际市场上只有欧盟和美国这两个参与者（考虑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体量，这样的假设并不是太过离谱），如果双方都尊重现行的国际贸易秩序，则双方都可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当中。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单方面发起贸易制裁，则进攻方占有的市场份额略有上升。如果双方互相制裁，则国际贸易彻底瓦解，双方都受到损失。我们依据以下原则构建了双方的收益矩阵（见表 1a）：若双方互相自由贸易则收益为（1,1）；若单方面发起制裁，则进攻方受益，被动方受损，收益为（2,0）；若双方互相制裁则贸易瓦解，这种情形下双方都损失惨重，因此受益为（-10, -10）。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表示真实的经济收益。

表 1 贸易战的一个博弈论模型

		1a. Mat收益矩阵 /-offs		1b. Mat概率矩阵 /oods	
		EU Co合作	制裁 tion	Co合作	制裁 tion
US	Co合作	1,1	0,2	$(10/11)*(10/11) = 100/121$	$(10/11)*(1/11) = 10/121$
	San制裁	2,0	-10,-10	$(1/11)*(10/11) = 10/121$	$(1/11)*(1/11) = 1/121$

这个简单模型的有趣之处在于，双方维持自由贸易、皆大欢喜的（1,1）局面并不会在一开始就自动实现。由于双方都有单方面制裁对方的冲动，因此如果只考虑短期利益，美国确实有激励单方面发起制裁。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发起了制裁，欧盟应该做何反应呢？我们在此处为欧盟引入混合策略的选择（见表 1b）。此时，双方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每 11 次对决中选择 10 次合作，1 次制裁（证明过程见作者原文附录）。这反映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双方都认同相互制裁的后果是非常糟糕的。

基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1、对双方来说最好的结果恰恰是最可能（概率为 100/121）的策略组合，这一推论与现实世界是吻合的——尽管双方都有重返单边主义的动机，但两国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为了共赢的局面而选择合作；

2、最差的结果概率是相当小的（仅为 1/121）。这是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如果彻底以邻为壑，那么双方都将面临惨重的损失。

3、但是，这种最糟糕的结果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双输的可能，两国合作才会在长期成为稳定的策略组合；

4、最后，一方获利，一方受损的局面也是可能出现的，尽管概率并不很高（即 $2 \times 10/121$ ），这意味着总有一方存在偏离合作均衡的动机；

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贸易博弈每天都在发生。如果美欧双方有任何一方在博弈中树立了咄咄逼人的形象，那么它将受益于这种形象。但是，如果双方同时采取了进攻性策略，那么结果将会是悲剧性的。如今，特朗普总统已经无数次宣称现有的国际贸易损害了美国利益。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先前假设的收益矩阵也将发生相应变化。美国已经对多国宣布发起贸易制裁，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认为全面贸易战对自己的损害较小。因此，在双方互相制裁的局面中，美国受的损失要比欧盟小，因此我们可以在表 2a 中将双输局面里美国的收益由-10 调整为-1。与前文类似，我们在表 2b 中展示了混合策略均衡的结果。我们会发现，在目前的假设下，欧盟选择制裁的概率陡增至 1/2（即 $10/22 + 1/22 = 1/2$ ）。这意味着，由于美国宣称自己不怕贸易战，欧盟将被迫大大提高反击的概率。也就是说，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度将逼迫欧盟采取类似态度。那么，双方爆发全面贸易战，国际贸易秩序彻底瓦解的概率（由之前的 1/121 猛增至现在的 1/22）也将大大增加，再也不是像先前那样只是个小概率事件了。

表 2 修正后的贸易战模型

2a. Matrix of pay-offs				2b. Matrix of probabilities			
		EU				EU	
US	Cooperate	1,1	0,2	Cooperate	$(10/11) \times (1/2) = 10/22$	Sanction	$(10/11) \times (1/2) = 10/22$
	Sanction	2,0	-1,-10	Cooperate	$(1/11) \times (1/2) = 1/22$	Sanction	$(1/11) \times (1/2) = 1/22$

以上我们使用的逻辑框架就是经典的“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我们从以上分析得知，随着对手愈发激进，欧盟选择反击的概率也将随之大幅提高，因为这是欧盟所能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美国提升贸易

战的威胁，欧盟也有必要迅速加以反击。由此可见，来之不易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如今确有崩溃的危险。

抛开博弈论的理论分析，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欧盟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搞清特朗普政府的深层意图。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正试图减少美国负担的超级大国的责任。客观地讲，这样的趋势早已有之。早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就有不少决策精英开始反思：“美国在全球四处出击，这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但是，特朗普政府目前激进的做法危害还是空前的——不仅对其他国家是这样，对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来说也是如此。面对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逐步收缩，在贸易战上又强势出击的局面，其他国家将如何反应？我们可以从各国对美国提高关税的回应中看出端倪。欧盟贸易专员 Cecilia Malmström 在今年 7 月 19 日的讲话中表示，欧盟对美国钢铝关税的反击措施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通过 WTO 平台进行反制；第二是欧盟将根据 WTO 赋予其的权力，制定对美国部分产品的报复清单，根据 WTO 规则，这些报复性关税中的大部分都将在三年后才宣告生效；最后，欧盟将制定一系列措施，防止美国的关税政策损害欧盟企业利益。Malmström 将欧盟的反制原则概括为“理性、对等、尊重国际准则”。

我们认为，欧盟应遵循以下几条准则，理性地制定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1、尽管我们不能阻止贸易战升级，但我们可以竭力控制贸易战的程度。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Dani Rodrik 最近表示，为了让美国也从贸易战中切身感受到损失，其他国家必须反制。显然，如果所有国家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那贸易战对美国来说就是零成本的。这个观点与我们先前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为了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并进一步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欧盟有必要尽快制定切实的反制措施；

2、欧盟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中国当然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其他国家也很重要。近期欧盟与日本和加拿大达成的贸易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通过与其他国家进一步密切经贸往来，欧盟不仅能从国际贸易中继续受益，更能够为维护全球贸易格局做出贡献；

3、欧盟应当带头遵守现行的 WTO 准则。正如欧盟贸易专员前不久所说的那样，欧盟的反制措施也必须尊重 WTO 的规则，这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秩序至关重要。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 WTO 的部分机制确实亟待改革，欧盟委员会已经就此提出了一份建议，未来欧盟应就此做出更多努力；

4、最后，欧盟也应该继续坚持“贸易有益于所有参与方”的正确立场。尽管贸易战在短期确实可能让进攻方尝到甜头，但长期来看，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这正是贸易多边主义的基础所在。

本文原题名为“The EU Response to US Trade Tariffs”。本文作者 Maria Demertzis 和 Gustav Fredriksson 都是位于布鲁塞尔的经济智库 Bruegel 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研究院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重塑 WTO

William Alan Reinsch/文 安靖宜/编译

导读：CSIS 上周举办了美国大使 Dennis Shea 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公众访谈，关于重塑 WTO 的讨论再一次被提上日程。WTO 的通报原则和差异化原则的落实都遭受到非议，新兴经济体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挫伤了发达国家承担义务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担心对于 WTO 的批评无法解决，而特朗普总统会退出 WTO 组织，这将对美国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伤害。编译如下：

CSIS 上周举办了美国大使 Dennis Shea 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公众访谈。这一访谈没有造成什么大新闻，这也让 Shea 松了口气。在最好的时候，WTO 都很少制造头条，况且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在捍卫和解释本届政府对 WTO 的政策方面，Shea 确实做得很好。

从好的方面来讲，他提出总统的“破坏建设性”政策使得关于 WTO 的讨论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也使得 WTO 开始着手解决那些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新问题——往届政府也对此发出过抱怨——但是其它国家似乎都把这些问题的隐藏起来，转而讨论其他问题了。

首先，美国提出的问题集中在 WTO 的核心责任上，比如，通报问题和差异化问题。前者指 WTO 要求成员国向 WTO 总部通报其信息。这条规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 WTO 不知道成员国活动的基本信息，他们如何能够发现那些需要协商的问题？不幸的是，这项条款常常无法落实，许多如中国之类的国家选择不完全通报甚至不通报，而监督机制又不够完善。

第二项差异化问题则指对于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方面长期存在的原则问题。尽管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思路——贫穷国家不必像富裕国家一样达到 WTO 的全部标准——但它也被一些已经逐渐不再处于发展中状态但依然坚持差别待遇的国家所利用，这样这些国家就无需进到它们应尽的义务。比如，G20 中有 10 个国家声称他们是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另外，新加坡、卡塔尔和科威特也依然被视作发展中国家。

无法执行这些准则使得 WTO 的约束力减弱，而这也成为它最大的问题——新兴经济体不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一体系，而富裕国家已经付出太多，逐渐不愿意继续支付超出自身责任的东西。双方这样的心态造成了多哈会议的失败，同时也阻碍了 WTO 的进一步发展。其它国家也在强调这一问题——加拿大接下来几周将在渥太华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 WTO 改革问题；而欧盟也发布了相关议题的论文。

同样地，美国强有力地谴责了 WTO 上诉机构不遵循其原则、权力僭越以及在司法方面的越权行为。有些人认为这些努力就像是一群失业的律师试图拿到他们从前代理案件的诉讼费，但这一想法是不正确的。这一问题正如上届政府指出的一样，在如今依然真实存在，而这也会影响到 WTO 的声誉。

从坏的方面来看，这些对于 WTO 的攻击再次体现出当局渴望发现 WTO 的病因，并使用错误的药方来医治这一问题（就像对待中国问题一样）。这种对抗的方式虽然有效地表现出当局的担忧以及解决这些早应解决的问题的决心，但是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摧毁上诉机构的策略，可能会使得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有效方案更难实现。美国是 WTO 上诉机构重要的申请方和应答方，我们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案件尚未解决，比如那些飞机制造行业，我们为保护国家安全对钢铁和里制品施加的关税，以及中国市场的经济状况的案件。如果上诉结果未按照期望的路径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也不能确保胜利。而这会使我们不耐烦的总统决定退出 WTO，而这一行为回对美国经济和贸易体系带来深远的恶果。我最后的问题是 Shea 是否准备离职了。但他并没有这个打算，让我们希望他能长期工作下去吧。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

Silvia Merler /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获奖理由是他们分别将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纳入到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本文将回顾各位经济学家对该颁奖结果的反响。编译如下：

多伦多大学战略管理学助理教授凯文·布莱恩（Kevin Bryan）在《沃克斯》欧洲版上发表一篇文章，重述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做出的贡献，以及贡献之间的相互联系。诺德豪斯和罗默多年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的角逐中呼声很高，但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的奖项竟然联合授予他们二人。诺德豪斯以其环境经济学而闻名，而罗默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言人。经过细想，他们研究领域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跟随罗默，我们开始用一般均衡模型来思考人类为什么会生产新技术。而其与诺德豪斯研究领域的联系则来源于一个难题，经济增长既是这个难题的成因，也是这个难题的潜在解决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环境问题愈发引起重视。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IAM）具有索洛模型的内生储蓄特征，将较低经济增长与较缓气候变化间的权衡取舍进行精确刻画，同时也对社会贴现率的至关重要性以及调整气候变化的微观成本进行清晰阐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列出诺德豪斯和罗默写的其他可供阅读的材料，在“经济学人观点”（Economist's View）博客上有更多的链接。美国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讨论了两位获奖者的贡献，但他并没有预料到罗默和诺德豪斯会在同一年获奖。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录制了一段视频讨论罗默的贡献，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则创作了两篇单独的传记，一篇讨论罗默的贡献，另一篇讨论诺德豪斯的贡献。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认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技术和环境变化已经改变了经济运转的方式。下次我们再为自己最喜爱的手机应用程序感到惊叹或者为日发极端的天气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罗默和诺德豪斯。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创新和气候变化问题。因此，他们二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

经济学家彼得·多曼（Peter Dorman）想谈谈非获奖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也是极其重要的。诺德豪斯多年来一直与哈佛大学的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争论不休，马丁·韦茨曼拒绝使用“社会碳成本法”进行分析，因为他认为理性的政策应该基于避免最坏结果的保险原则。他的“忧郁理论”表明在

某种假设下，长尾事件发生可能性下降的速度，并没有比他们造成灾难程度的上升速度更快，因此他们的预期成本将无限制地加大，这对于气候变化也同样适用。韦茨曼的研究结果经常被那些认为需要采取更积极行动来限制碳排放的人所援引。正因为如此，每当经济学家推测谁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诺德豪斯设想”通常也被称作“诺德豪斯-韦茨曼争论”。多曼认为，诺德豪斯与罗默的组合是如此刻意和难以理解，不禁使人认为，诺德豪斯获奖与韦茨曼没有获奖传达出同等重要的信号——这显然是一份未来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声明。

不出所料，沃福德学院经济学教授蒂莫西·特雷尔（Timothy Terrell）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诺贝尔委员会通过此次选择推动了环境监管。两位经济学家都看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罗默建议国家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并且出台专利法保护经济增长；诺德豪斯则认为政府需要在防止气候恶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与韦茨曼的观点相反，特雷尔声称自由市场才是发展更清洁技术以及孕育新思想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创新、财富创造和更健康的人民只有在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才能觅得踪影。

经济学记者大卫·沃什（David Warsh）辩称，虽然诺德豪斯和罗默明显在不同领域研究不同问题，但是很少被人提及的是，他们研究成果的结合非常引人注目。诺德豪斯对大气层碳排放量、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进行建模，因此使估算温度升高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变为可能。碳税（他和其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比“巴黎协定”规定的碳排放交易制度更可取）可以防止最严重的损害，实验性地以一个低排放量起步，逐渐增大排放量以达到造成损害的临界值。相反，罗默创造了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像碳税一样的税收很有可能会激起创新的浪潮，而这些创新将可能会有效降低碳排放。

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乔舒亚·甘斯（Joshua Gans）写道，诺德豪斯与罗默被联系起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使自己想法具有说服力的方式相同，并且受众并不是普罗大众或者政客们，而是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气候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都面临巨大阻碍。而在其中高举环境治理或者科技创新政策旗帜的主力军也是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罗默参与了每次政策研讨，并且在有巨大阻碍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以保持平衡。因此，两人的案例都表明对经济因素需要多么谨慎细致的诠释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并且取得进展。

科学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写道，除了纪念两位经济学家对其领域做出的深刻贡献外，这个奖项指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增长。而现在世界竟然开始轻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着增长放缓以及富裕国家生产力的停滞不前，罗默深刻的见解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原题名为“The 2018 Nobel Priz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为布鲁盖尔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贸易战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Massimiliano Cali /文 杨茜/编译

导读：美中贸易战迅速升级，有可能破坏两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本文初步估算了贸易战对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影响。通过结合贸易和关税数据，本文对预期影响进行了估算，并推算出了该地区可能的赢家和输家。编译如下：

特朗普政府最近决定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一轮关税，这把美中贸易争端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新列表上的产品进口关税将上调 10 个百分点，到今年年末这些产品最终将上调 25 个百分点。这代表了 7 月 6 日和 8 月 23 日美国前两次上调自中国进口关税之后，又对中国加税产品范围进行了大幅扩张。这次加税引起中国报复。在美国关税生效的同一天，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类似金额产品加征 25% 关税。

正如大萧条时期的经验表明，这种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可能对交战各方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McDonald 等，1997，Eichengreen & Irwin，2010）。与此同时，它也会影响第三国，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和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本文中，我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潜在贸易和投资影响进行新的局部均衡估计，重点放在东亚地区。鉴于这些国家及地区已经融入了由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并且出口商品篮子与中国具有相似性，该地区的国家最容易受到影响。我将重点关注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上涨对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影响。

直接贸易和投资影响。

我首先估计了关税增加的预期进口响应。为此，我将 2017 年美国统计局 HS8 位编码的美国进口数据，HS6 位编码产品的价格弹性（Kee 等人 2008 年估算）和已公布的受美国三阶段关税限制的中国产品清单结合起来。我假设进口价格与关税成比例增加，然后乘以相关弹性和进口价值，以获得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预期减少量。

我的计算表明，2017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量中的 2348 亿美元将受影响，其中 1889 亿美元来自于最后一阶段的征税（表 1），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 13.6% 和全球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 3%。中国出口的预期下降将导致国内增加值减少 414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3%。这是对中国出口直接影响的上限，因为它没有考虑这些出口品可能转向第三国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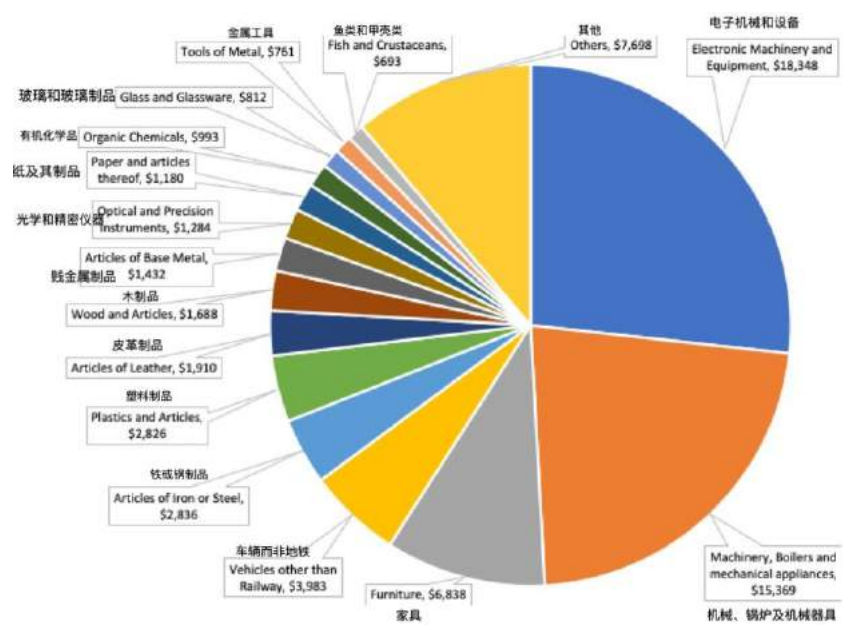
表 1 受关税措施影响的美国从中国进口品的价值

	第一次公告时目标进口品价值（十亿美元）	生效期的目标进口品价值（十亿美元）
第一批	32.3（4 月 3 日）	32.3（7 月 6 日）
第二批	13.8（4 月 3 日）	13.7（8 月 23 日）
第三批	197.2（7 月 10 日）	188.9（7 月 24 日）
总计		234.8

注：作者估算。

受影响的进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电子设备和机械及其部件（图 1）。电子和光学设备（包括电视和录音设备）及其部件，以及机械、锅炉及机械器具，几乎占美国自中国进口预计下降总额的一半。另外，消费品也有大量下降，例如家具、车辆、皮革制品以及鱼类和甲壳类动物，这可能对美国部分家庭消费篮子产生一些直接影响。

图 1 因美国关税上调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预期下降值（HS-2 分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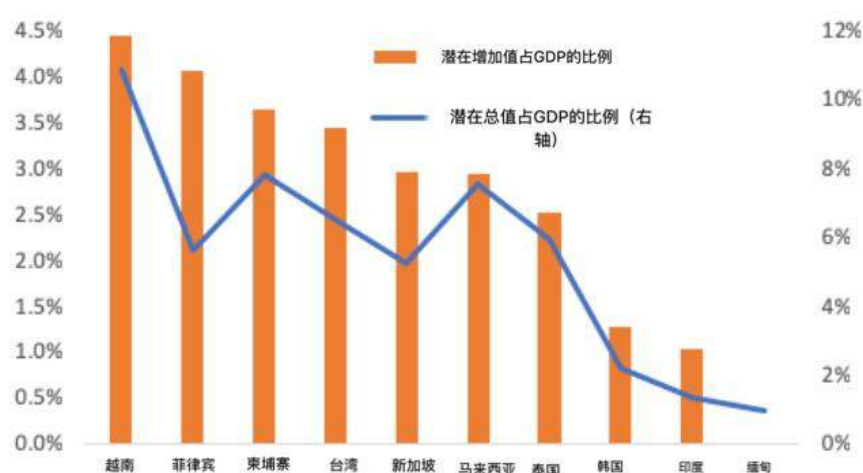
注：作者估算。

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的好处是美国的进口可能转向非中国供应商，特别是东亚地区，因为那里的出口结构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为了解这些潜在的出口机会，我列出了部分在美国市场将被征收更高关税的中国产品（HS-8 位编码），同时又确保这些产品在 2017 年由其他东亚国家出口到美国的总价值不低于 1000 万美元。

我认为一个已经向某一市场出口不可忽略数量相同产品的国家更有可能取代该市场中的现有这种产品的出口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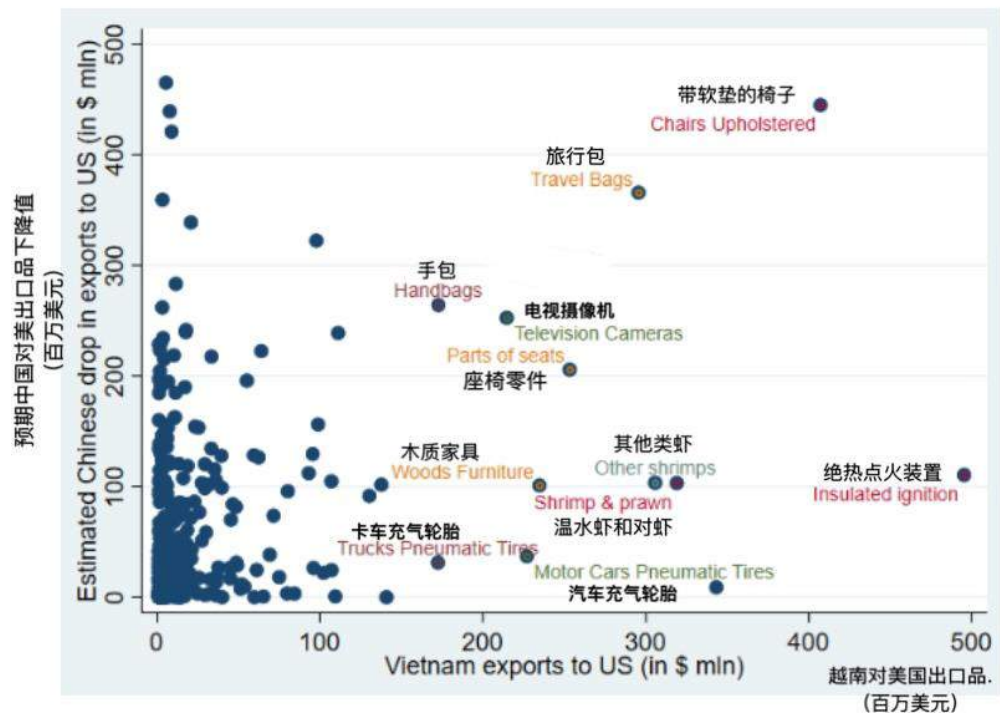
根据这一指标，东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取代中国在美国出口品的潜力相当大。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是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具有最大替代潜力的东亚国家（图 2）。越南已经向美国供应至少 1000 万美元的产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估计值相当于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 10.9%，或者考虑国内增加值，这一数值占 GDP 的 4.4%。最大的替代机会集中在那些预计中国出口下降和越南现有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数量都较大的产品，如椅子、绝热点火装置、温水虾和对虾、旅行包、座椅零件、电视摄像机、木制家具和手袋（图 3）。而柬埔寨的替代机会则更多的是一些小件产品，包括胶合板板、手包、旅行和运动包、圣诞树照明装置、狗或猫的食物、部分座椅和自行车，这反映了柬埔寨出口篮子的高度集中。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也有不可忽视的出口替代潜力。印度尼西亚的潜在替代品更为有限，对美国出口的中国产品出口额仅相当于印度尼西亚 GDP 的 1.3%，而考虑国内附加值，仅占 GDP 的 1.0%。

图 2 各国替代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潜在值（占 GDP 的百分比）



注：作者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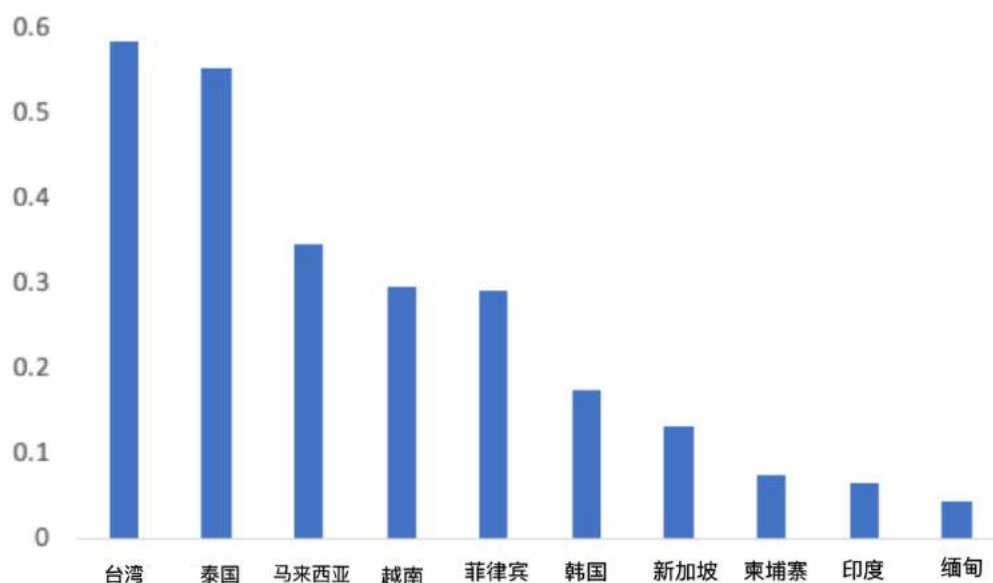
图 3 越南可替代中国在美国出口的主要潜在产品



注：作者估算。

通过提高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服务的成本，贸易战还可能导致投资转向第三国。这种转移可能主要涉及相关绕过美国进口关税上调问题的中国投资。同样以服务美国市场为目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相关市场生产同种受影响产品的能力，以及对贸易战持续时间的看法。我通过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预期降幅与美国从每个东亚国家进口产品（HS-8 位编码）的相关指数来衡量这种能力。该指数的价值在台湾地区最高，其次是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指数最低。尽管该排名试图只获取用于投资选择的几个标准之一，但它表明，基于与中国类似的现有出口篮子，潜在投资目的地之间的相对吸引力存在差异。

图4 受影响产品的出口篮子与美国和中国的相似程度（HS-8 位编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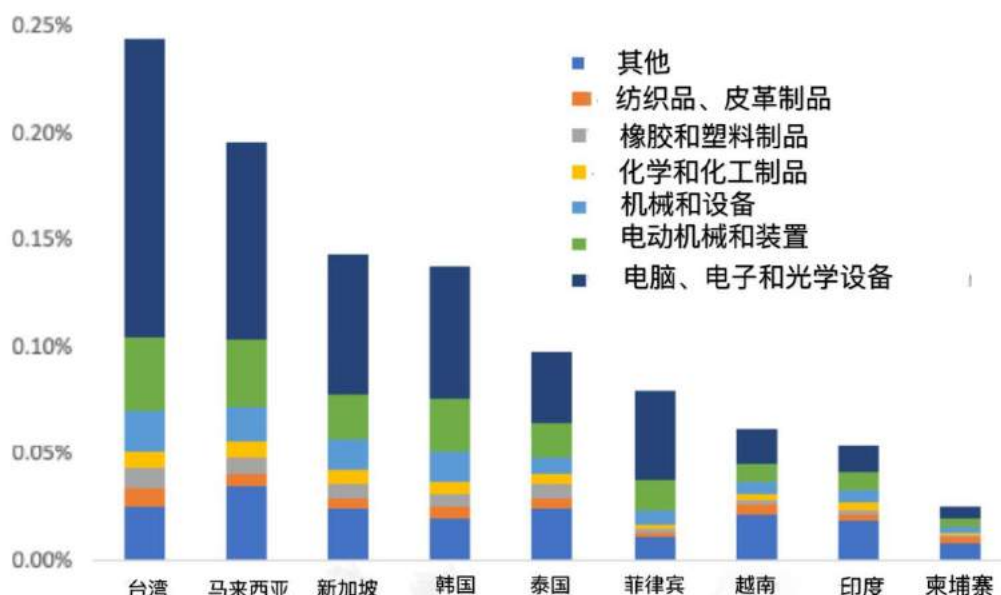
注：作者估算。

间接贸易影响

虽然中国逐步吸收了各个行业的大部分价值链（Kee 和 Tang，2016），但仍然依赖进口外国中间产品和部分生产的最终投入。东亚国家是此类中间体和投入的主要供应商。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的预期下降可能会通过反向联系对这些国家产生冲击。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每个国家对价值链的贡献。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各国在生产受关税影响的产品时向中国提供的中间体和原料。

为了衡量这个渠道的重要性，我将我们估计的在 HS-8 位编码下的中国出口产品降幅与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国别增加值所占的份额相匹配（可从 OECD TiVA 获得数据）。台湾和马来西亚是最容易受到供应链中中国出口下降影响的东亚地区，估计 GDP 的损失分别为 0.24% 和 0.20%（图 5）。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子和光学设备以及电机提供了投入，这占了损失的三分之二。预计新加坡、韩国和泰国将通过该渠道损失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1%，而由于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较低，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影响相对较小。

图 5 通过供应联系，估计中美贸易战对各国及地区 GDP 的影响



注：作者估算。

虽然这些负面影响小于估计的（正的）出口替代潜力，但这两个数字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后者是替代潜力的上限。事实上，替代效应的真实维度可能比图 2 中报告的要小得多，原因有两个：第一，每个国家将竞争相同的潜在市场；第二，任何这种替代都将取决于每个国家产品的供应反应，在许多情况下，供应反应可能相对较小（甚至为零）。另一方面，通过供应链计算的影响可能会提供更准确的数量级的实际损失。

这种类型的分析可以帮助东亚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从美中贸易战中找出国内生产商的潜在赢家和输家。各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帮助前者取代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出口：为进口投入提供便利（东亚出口企业大量使用进口投入），并确保增加生产和出口所需的融资，包括贸易融资。同时，帮助潜在的输家重新分配他们的生产和/或劳动力可以减少贸易战的国内成本。

本文原题为“The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East Asia”。本文作者 Massimiliano Calì 为世界银行雅加达办事处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国际市场对中国新开放政策响应平平

Alicia Garcia-Herreo /文 张子萱/编译

导读：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热烈欢迎。然而近期银监会和保监会放宽中国金融机构外资所有权限制的举措却反响平平。对于中国来说，改革迈出的步伐过小、举措过迟可能是造成明显利益缺失的关键所在。编译如下：

去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不久之后，李克强总理便宣布中国将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例限制。

然而继媒体首轮宣传后，市场却反应平平：没有股市（确切指积极的）波动，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机构股份也明显没有收购意向。在 2016 年已高达 40 万亿美元的中国金融市场，依然难以引起外国机构在中国开拓金融业务足够的兴趣。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一对外资开放的举措本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文将解读这一突破性举措为何付诸东流。

1、政策视角分析

第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政策缺乏一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设立的境外投资黑名单这一矛盾的管理办法。但此次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清晰，中资银行长期以来对外资单一实体实施的 20% 参资上限（联合实体则为 25%）已被解除，且立即生效，对于证券与保险业的参资上限也调至 51%。

这一政策的发布向世界传递了中国领导人依然致力于金融行业自由开发的信息。虽然美国多年来一直就金融服务开放方面游说中国，但这一次政策恰好发布在了一个有助于缓解了特朗普新政府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压力时间节点。

自 2001 年以来，外国投资者经历过了种种不如意。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掌控一家中国金融机构即将成为一种可能，这是远远超乎预期的。据中国银监会，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年底，约有 2.9 万亿人民币的资产为外资银行持有，约占货币总量的 1.3%，为 2003 年来历史最低。尽管高盛、汇丰、瑞银、花旗和美国银行等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战略性收购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部分股份，但随后又将其陆续抛售。这些投资为外资银行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利得，但这些金融机构并未建立起对华业务。

2、外国投资机构侧分析

既然新开放政策反响平平不是因为它的清晰度，我们就要考虑外国金融机构在其中的作用了。政策效果不达预期的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外国投资者已经等待太久。因为长时间对中国解除国外投资限制的诉求，这一政策的可信度已低

于他们的心理预期。而且就改革进程而言，在外国投资者眼中中国政府的可信度也没有很高。美国和欧洲商会在过去几年发表的意见声明都彰显了对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抱幻想。

其次，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国金融机构开始明显警惕金融投资风险。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过度投资的银行家在经历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变得更加谨慎，也因为监管不断受限，融资成本不断攀升。影响到外资金机构对中国市场积极度的便是高昂的融资成本。如果一家公司想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参与竞争，庞大的资金量是必须的。中国的资产量急剧扩张，金融业发展如雨后春笋，在这样的中国市场上，资金量则尤为关键。美国和欧洲银行的高资金成本显然阻碍了他们探索中国金融市场的步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变得更加敌对。这一态势变化的原因要从特朗普 11 月来访亚洲说起，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标志霸权开始从美国向中国倾斜的一个重要节点。但特朗普在上台后，并没有明确表态美国对中国的方针。在这种消极的背景下，特朗普的贸易限制风波于 2 月 7 日开始，首先他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了进口关税。1 随之而来的，是几个更关键的出口品关税，他们都涉及到了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

迄今为止，中国的贸易战策略一直都是要反击，但市场留给中国反击的空间太小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远不及对美的出口，一旦美国开始对价值两千亿美元的出口品强制性征收最后一批关税，中方将束手无策。因此，在贸易战中中国如果想持续的与美国抗衡，必须诉诸于其他办法。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紧盯美国在华投资。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美国寻找收购中国资产的机会。可能这一套也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超过中国对美国的依赖。

3、中国政府的抉择

从以往经验来看，中国表意含糊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巧合。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一旦市场对外开放，中国的投资者们将即可获得利益。事实上，在银行资产负债率的大幅增长和不良贷款的积累之后，中国的监管者似乎更喜欢通过市场主导来推动不良资产的清理，而不是像世纪初时，将大量的公共资金用于银行资产的重组。

过去几年的信贷扩张、股转债政策的施行、大规模的证券化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市场的驱动下被重组。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外资银行则受到了欢迎。它们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管理不良资产的办法，在不亏损情况下甚至有助于风险的再配置。

中国没有预料到的是，外国当局居然会对这么一个庞大且极具诱惑的市场失去兴趣。然而事实确实如此。首先，中国的高估值成为外国机构收购同业股份的

一个阻碍。而且因为总是需要按照政府意图发表观点，行为和观点受政策影响大，他们对此十分警惕。此外在募集资金，购买中国金融机构股权这方面，外国机构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与此同时，贸易战已经证明，特朗普变成了中国的敌人。这对任何一个在华有资金动向的外国投资者都不是一个好兆头。作为处于监管尤为严格的一个行业，金融机构比那些个人的投资者有危机感。因为他们的业务与中国政府的行动密不可分，更容易受到特朗普激进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资本市场和外国投资机构在面对一个一心想开放金融机构的中国政府，做出冷淡反应并不是一个值得惊讶的事情。不过我们确实认为中国开放市场的时机如果提前则为更佳，这样以来很多现有的冲突皆可避免。

本文原题为“Global Markets’ Tepid Reaction to China’s New Opening”。本文作者 Alicia Garcia-Herrero 为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任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兼职教授。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负重前行

经济学人时评 吴克谦/编译

导读：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国内信心遭受打击、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政府流露出了一些不安情绪，采取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正在放缓，但形势并没有很严峻，所以仍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以免悲观情绪被放大。编译如下：

16 世纪初，明朝官员王献臣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官场政治，回到了故乡苏州，建造了一个宁静沉思的好去处——“拙政园”。今天的拙政园依然很美，但它的宁静早已不复存在，国庆长假中每天约有 3 万人走过石拱桥，排队的人群延伸到临近街区。黄金周期间，中国国内旅游景点的游客达 7.26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9%。中国的执政者们仍“毫不谦虚”地将此视为经济复苏的证据，尽管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担忧。

外部环境并不乐观。中美贸易战正在升温，美国副总统彭斯在 10 月 4 日的演讲中指责中国的经济侵略，并表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轮关税（涉及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已于 9 月生效，并且税率将在 2019 年年初上调。中国遇到的麻烦很容易扩散，特朗普政府曾表示，希望阻止包括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与中国进行贸易协议的谈判。

国内信心遭受打击。沪深 300 指数自 1 月份以来下跌了 29%，中国股市成为全球今年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稳定债务水平和打击影子银行的努力，已经耗尽了股市的流动性。许多国内投资者也对中国政治的走向感到不安，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承诺要让国有企业“更强、更好、更大”，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观点，即政府对企业家态度正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自 2 月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近 10%，虽然人民币的表现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类似，但仍有可能加剧贸易战的风险。10 月 10 日，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警告中国不要进行竞争性贬值。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努力减缓人民币的贬值速度，担心人民币走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上海一家大型外资银行的外汇交易员表示，上个月监管机构曾批评他的团队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支持人民币。当前中国国内情绪低迷，宣传部门已对国内媒体下令，要求对经济的报道更加积极正面，因此国庆期间出现了大量关于强劲旅游数据的报道。

政府自身也流露出了一些不安情绪。目前，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转向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10 月 7 日，中国央行降低了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年内第四次下调，释放了约 7500 亿元人民币（合 1080 亿美元）额外可贷资金。

中国央行尚未下调基准利率，但自今年 1 月以来一直引导债券收益率下行约一个百分点（见图表）。

图 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债券收益率变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财政政策也将更加积极。10 月 8 日，国务院宣布给予出口商更大的税收返还，并呼吁地方政府加快投资计划，这是中国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信号。

但是，政府错误地认为这些举措会改变投资者的观点，事实上，国庆后股市大幅下跌，同时人民币汇率跌至约 1 美元兑 7 元人民币，这是十多年来没有突破的水平。虽然部分原因是中国股市在休市一周后随全球市场补跌，但这种下跌反映出的更深层次的事实是：这些宽松的政策只是暂时性的。

中国在规范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政府不想就此放弃。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最近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必须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目前，按实际值计算，债券收益率比 2016 年末高出一个百分点，当时政府正专注于加快增长。此外，一场整治偷税漏税的行动对小公司的打击尤为严重。同时，政府继续限制高负债公司的借款。

这些限制措施是合理的，虽然中国的经济可能正在放缓，但形势并没有很严峻。在经济年增速仍保持在 6.5% 左右的情况下，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将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过度反应，人们很容易夸大这种悲观情绪。例如，一些人指出，国庆长假期间游客人数增长 9%，这是十年来国内旅游增速首次低于两位数。但事实上，那些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几乎无法再承接更多的游客。在拙政园里，每张照片里肯定还会有几十个其他游客，一些大胆的游客甚至爬上了铺着灰色砖瓦的屋顶，以寻求独处的错觉。

本文原题为“China Inches Towards Stimulus as the Economy Slows”。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The Economist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一带一路的代价

Samira Shackle/文 王婉婷/编译

导读：北京方面看似无止境的贷款并非毫无附加条件。记者萨米拉·沙克尔探究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对亚洲的影响。编译如下：

汉班托特位于斯里兰卡南部的尖端处，其天然海港临近国际航线。古斯里兰卡时期，这一地区——早在公元前 250 年就具备了可运作的港口——对经济体至关重要。那时，中国和阿拉伯商人把它当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然而在现代，汉班托特作为被 2014 年海啸所影响的主要城镇，正处于欠发达状态。

2008 年，一个新的海港开始了建设。它是当时的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智慧结晶。拉贾帕克萨梦想把这个作为他的祖籍的地区转变成一个旅游和商业中心。他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那个港口能减轻商业化的首都科伦坡高度发达的海港的压力。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断言。汉班托特港口让很多关于可行性的调查失望了。作为地域权势掌控者和斯里兰卡的同盟之一的印度拒绝为它提供经费。然而，中国却站了出来。

港口在 2010 年开始运营；中国承担了预估的 3.61 亿美元标价（全部以美国通货形式表示）的 85% 的费用。

可以预测，这一港口是一个失败。虽然紧邻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汉班托特在 2012 年仅接纳了数万艘过往船只中的 34 艘。2017 年二月，由于难以支付还款，斯里兰卡政府同意向中国出租港口和周围 1500 英亩的土地，租期为 99 年。

汉班托特是中国在斯里兰卡众多的投资项目之一。在紧随结束于 2009 年的内战之后的发展激流中，拉贾帕克萨向中国借贷了约 80 亿美元的资金以刺激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成功。

大规模的中国投资并非只针对斯里兰卡。据估计，北京在孟加拉的利息价值高达 35 万美金。中国在马尔代夫投资超过 20 个项目，其中仅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就与马尔代夫 GDP 的 40% 价值相当。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价值 620 亿美元，是一个由高速公路、铁路和发电厂共同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连接着中国新疆地区和巴基斯坦南部的瓜达尔港。巴基斯坦的政客宣称它将提供多达一万的工作机会。其他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位于印度尼西亚的一条高速公路链和一个位于柬埔寨的巨大的工业园——而这些只是中国在全球投资的变革项目中的一小部分。

这个工程在一个宏大的标语之下进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这个极其有雄心的国际化开发项目，中国正在亚洲及周边寻求推动贸易发展并刺激经济增长的机

会。这是习近平主席的署名外交政策，事关世界上约 65% 的人口和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咨询公司麦肯锡指出它超过了美国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沟通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有两条线路。第一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系列经由中亚和中东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陆路走廊。第二条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中国南部海岸与东非和地中海的海上航线。相关的花费令人眩目。据有人估计，中国计划每年向此类项目投入 1500 亿美元。一则在 2018 年早期发表的报导中，惠誉国际评级机构表示值得注目的 9000 亿美元投资项目已经在计划和实施中。

然而，对于所有的吹捧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被证明难以总结性地定义。

“它是一个巨大的，包罗万象的，模糊的概念。它并非真的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而是包含了在中国语境下各种不同的驱动和利益。” chinadialogue.net 的执行编辑兼查塔姆（宫）研究所的研究员萨姆·盖尔表示。

有些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标语而非政策，包含了中国所有的海外投资。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 9 月启动，但是它已经把一系列国际化项目涵盖在其中了，包括类似汉班托特港的一些长期推迟官方发行的项目。

近期，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把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全球经济低迷的中国举措”。同时，有论者表示中国慷慨的贷款并非慷慨捐助的表现，而是帝国主义野心的象征。一些国家发现自己已无力偿还贷款。

12 月 9 日，汉班托特上空的斯里兰卡国旗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上升的中国国旗。它只持续了一周，就在由一个当地佛教僧人领导的抗议中被降下。这个僧人把中国接管海港的行为类比成殖民侵略。把港口出租给中国的行为激起了斯里兰卡境内和国际上两方面的惊恐。在国内，它激怒了当地群众。民众担心斯里兰卡被困于债务陷阱之中，将在未来被迫出租更多资产。国际上，它惊动了他国政策制定者。他们怀疑中国在印度洋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军事水路上占据了战略据点。为对冲这一中国战略，今年 8 月，美国向斯里兰卡捐助了 3900 万美金以强化其海事安全。

当时支持这一港口的总统拉贾帕克萨在 2015 年已经被投票下台，但斯里兰卡的新任政府需要面对他所承担的债务的后果。

“债务陷阱对人民日常的生活状况有非常真实的影响，”一位名为阿曼萨·佩拉雷的立足于科伦坡的斯里兰卡记者声称，“通货处于压力之下，人们开始目睹油价和交通工具价格上涨。政策制定者把责任归咎于债务陷阱，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家已经进行了一些并不是那么合理的投资。”然而，大多数消极的公共反响都指向斯里兰卡政府而非中国。

当汉班托特港吸引了多数国际上的注意之时，它仅仅是中国在斯里兰卡一个远远大得多的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这些投资中，有一些卓有成效：原先已经存在的位于科伦坡的港口的扩建。这个港口现在已位列世界上最成功的海港。全国高速公路的改善也是一个例子。但其他的投资并不成功，尤其是位于南部沿海的投资。

例如，在 2017 年，汉班托特地区一个仅有 50000 人经过的新建机场；它每年只接纳一万人次的旅客。自从四年前它开始运营，它就作为世界上最荒无人烟的国际机场而闻名。

“在南方，我们见证了一系列空有其表的项目，”佩雷拉表示，“机场被建在除了灌木丛和村庄意外空无一物的地方。据一则环境影响报道称，当地一类主要居民是大象。你进入当地，建了一座机场，联通了道路。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有一些焦虑——主要是在印度——担心斯里兰卡债务危机的规模（其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达 77%）会引发更大的让步，例如允许中国把汉班托特用作军事基地。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论认为中国故意把他国困在债务陷阱之中以求获取让步和军事优势。然而，当一些专家争论无法维持的债务只是不充足的计划的副产品知识，是否真的存在一种明显的战略仍然值得讨论。“我无法相信人们会齐心寻找会成为极度欠缺规划的港口项目然后说：‘这一定不会赚钱，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好项目，因为它将失败然后我们就能拿到 99 年的租赁了，’”盖尔表示，“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把它解释为在海外投资上加速的，各自为政的而且可能是仓促的决策制定，相较于协调一致的把他国困入陷阱的努力更为合理。”

那么，中国为何持续投资境外项目呢？一个由全球发展中心进行的近期调查发现 23 个获得一带一路资金的国家债务压力的风险都在增长。其中八个国家——巴基斯坦，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蒙古，黑山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出现了不可维持的等级的国债。这意味着中国贷款的贫乏的收益，以及相关国家潜在的灾难性经济后果。受到影响的国家都是在他们相应的地区中最贫困的，并且将很快向中国借贷超过他们外债总数的一半的资金。

一些分析家表示，中国对经济前景堪忧的项目进行投资是漫无目的的投资方法和缺乏应有的谨慎的结果。“斯里兰卡的寓言表明，在借贷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因为中国并不会完成这项工作，”帕雷拉表示，“如果条件不足以支持借贷，他们会对条款进行再次谈判，而结果不太可能支持借债的政府。”

中国在核心产业上存在过剩产能，例如钢铁行业，而一带一路计划使它得以输出专家，人力，工厂和机械。多数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包括输入中国工程师以实施工程的计划。这种投资为中国工业创造了新的市场。中国公司正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规模参与全世界的建设工程。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项目合同上担保了超过 3400 亿美元。

“经济力量确实倾向于和军事和地缘政治利益相交，但我认为这并不局限于中国，”盖尔表示，“我倾向于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唯一合理的潜在驱动力是过剩的工业产能。不容否认那是创造新兴市场的经济动力。”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动因依然值得讨论，足够清晰的是中国看似无止境的贷款并非没有附加条件。在全球，包括曾经极度热衷的国家在内，项目延迟已经开始。马来西亚作为一带一路投资的巨大承担者，在今年取消了约有 30 亿美元的管线项目。吉隆坡已经另行暂缓了约有 200 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巴基斯坦正处于偿还危机之中，而这部分归因于向中国借贷的规模。今年十月，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紧急救助金。一位美国的部门发言人表示将对其请求进行慎重审核，因为“巴基斯坦把自己置身此境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债务。”

（两年前，斯里兰卡也曾申请——并成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助金以避免偿还危机的结算）。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偿还危机广为传播，政府——即使那些已经在债务危机中挣扎的政府——依然坚持向中国寻求帮助。虽然斯里兰卡把其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借贷，但它依然继续向中国借款 12.5 亿美元资金来为债务筹资。同样，巴基斯坦也在向中国寻求 10 至 20 亿美元的更多的贷款以缓解经济危机。值得注意，巴基斯坦对中国资金的不断上升的需求来源于美国终止了对其临时同盟的援助。美国致力于使巴基斯坦把注意力投放在国际恐怖主义融资观察名单，这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

负债国反复申请中国资金的原因很简单：可能没有其他足以实现如此大规模投资来源。

从 2009 至 2015 年，即拉贾帕克萨离职之时，由于西方对其在内战中滥用人权行为的压力，斯里兰卡无法获取国际上传统的，由西方支持的资金。“没有传统西方借贷者的资金流入，”帕雷拉表示，“所以如果不向中国借债，该从哪里获取资金？德里是一个选择，但它并不像北京一样有充足的资金。如果你想要扩建铁路和公路网络，中国是在这一地区唯一能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贷款的势力。你别无选择。”

本文原题为“The Cos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本文作者 Samira Shackle 为自由记者。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地位依然稳固

《经济学人》评论/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众所周知，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业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位置。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否能够逆转这一趋势，并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呢？作者认为，尽管贸易战引发了跨国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普遍担忧，但中国在这一领域依然拥有显著的优势。编译如下：

这里的一楼摆放着无数电子元件，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任何一种规格的转接头、连接线和螺丝，而且往往是几千个装成一袋。二楼则售卖着各式各样的电路板和配件，从摄像头到耳机无所不包。随着楼层的增高，出售的商品也越来越复杂，最终你会发现智能手机、无人机和悬浮滑板这类精密的科技产品。在大厦顶层（十楼），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 LED 聚宝盆，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这就是位于深圳华强北的赛格（SEG）电子市场，而这样的电子市场在华强北还有很多。对于科技迷来说，这里就仿佛是美好的糖果屋。但对于遍布中国、成千上万的电子器材厂商来说，这里更像是他们的展厅和销售点。如果你来到市场就会发现，尽管这里的商户并不介意搞零售，但他们主要的工作还是与电话那头的大客户洽谈批发生意。

华强北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电子市场完美诠释着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的重要地位。中国在电子产业雄踞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位置——来自世界各地（很多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芯片及其他元件不断输入中国，在这里被组装成产品，并被销往全球。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 Henry Yeung 教授的测算，全球超过 50% 的电子器材制造商都位于中国。此外，全世界超过半数的手机、40% 的半导体，以及几乎所有的电路板都是中国生产的。苹果公司有 200 家主要供应商，在这些供应商下属的工厂里，有 357 家在中国，而只有 63 家位于美国。

而时下正酣的中美贸易战也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朗普总统反复宣称，美国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如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是促使他下定决心开打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但对于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说，他们似乎有更多动机迫使电子产业的全球供应链撤出中国。除了大国竞争的战略角度外，美国政府高官近来也多次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比如今年 10 月 5 号，五角大楼就发出过类似的警告。而此前一天，《彭博商业周刊》刊登了那篇著名的报道，指责中国在出口的主板中安装间谍芯片，涉事企业包括亚马逊和苹果这样的硅谷巨头（两家企业都否认了相关报道，但也有一些学者，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 Greg Allen 表示该报道描述的故事是“可能的”）。

考虑到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升级战略（“中国制造 2025”），我们不难看出为何美国会如此紧张。事实上，早在特朗普上台前，类似的忧虑就已经出现在决策高层了。当时，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在向奥巴马汇报时，就明确指责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产业政策“不仅给市场带来了扭曲，还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追本溯源，中国在电子制造业的傲人地位起源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 21 世纪早期，为了降低成本，许多跨国公司都把部分制造业部门搬到了中国。尽管过去十几年来工业自动化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即便是在今天，电子产品制造业依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举例来说，苹果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富士康，仅在其深圳的工厂就雇佣了超过 25 万人。

但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经历了显著上升的过程。一些学者认为，仅 2011 年到 2016 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超过 60%。相比之下，如今越南和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不过，现在中国早已具备更多优势。如果读者亲自来深圳华强北考察一番，他一定会对这里庞大的电子产业生态圈留下深刻印象。从物流仓储到扫描打印，不管你需要哪种产品（少数高端元件除外，如处理器）或服务，这里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商家提供。Henry Yeung 教授表示：“由于大多数元件的供应都做到了本地化，深圳当地的综合生产成本还是比其他地方更低。”在过去十几年间，随着深圳电子产业生态圈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硬件组装和制造厂商被吸引而来。这其中的道理与硅谷非常相似——数量庞大的风投基金、律所和其他服务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来此安家。

不过，这种集中化生产的优势是否是牢不可破的呢？恐怕并非如此。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Greg Linden 教授就注意到，当前许多汽车巨头的零件供应商都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是因为平摊在零件上的运输成本对于汽车来说是相当小的。即便是在电子产业，集中化生产的格局也正在被打破。近几年来，为了抵消中国快速上涨的用工成本，以及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产地依赖，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已经开始着手将部分制造部门撤出中国。比如说，自 2009 年以来，三星公司已经将大部门手机装配部门转移到了越南，这使得越南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出口国之一。（见图 1）

图1 各国手机出口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显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威胁将加速这一过程。目前，包括韩国 SK 海力士电子（SK Hynix）和日本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在内的几家大型企业都已近开始着手将制造部门撤离中国，中国台湾的仁宝电子（Compal Electronics）据称也在考虑重启在越南的工厂。而以美国捷普电子（Jabil）为代表的一些跨国承包商则将贸易战视作自己的机会，因为他们其他国家已经拥有相对成熟的生产网络和经验，因此其面临的供应链跨国转移成本也相对更低。

再小的涓涓细流，如果任其发展，最终也可能变成滔滔江水。倘若贸易战局势急剧恶化，或者业界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继续加剧，更多跨国企业或将考虑把制造业部门撤离中国。不过，目前中国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有明显的优势：越南的基础设施比中国差得多，而印度低下的行政效率更是令外资企业望而生畏。

当前，特朗普内阁一些要员脑海里萦绕的恰恰是这套逻辑——通过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政府可以迫使制造业回流，从而提振美国国内就业。但我们必须指

出，这样的想法无非是幻觉而已。对于富士康和苹果这样的企业，他们大可重返美国开设新工厂，在制造高技术产品的同时达成附带的政治目的。但对于那些中低端的电子器材装配厂来说，他们永远不可能将生产线搬去美国——毕竟，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做这种收入低、强度大的重复性劳动呢？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目前别无他法，只能一边祈祷贸易战快点结束，一边尝试将额外的关税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此外，我们也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从而更好地确保供应链安全。

近来部分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在未来，电子产品制造业和部分 IT 产业（包括一些通讯基础设施）可能分化为两个互相独立的阵营——一个是欧美国家阵营，另一个则是中国及其他国家阵营。从目前各国电子产品制造业高度相互依赖的现状来看，两大阵营在将来要做到完全隔绝恐怕不大现实。但近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贸易战威胁、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等）确实促使中美两国电子及通讯行业巨头都希望减少对对方的依赖。目前，科技界的冷战还远远没有到来。但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大环境还在继续恶化。

本文原题为“China’s Grip on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will be Hard to Break”。本文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刊于《经济学人》商业版。[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